“新三条”明晰宏观调控大方向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就下一步宏观政策强调,“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对此,权威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解读说,所谓“宏观政策要稳”,一方面应保持积极稳健的政策组合和政策基调不变,另一方面也强调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更严峻局面的政策预案与项目储备。

“未来经济增速如果继续下行,如季度GDP增速低于7%、月度工业增加值低于8%、就业形势更加困难,可适当放松财政货币政策,果断采取减税发债、降息降准、放松信贷等举措,以释放流动性。”该人士认为,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应是促进消费增长,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所谓“微观政策要活”,在其看来,也应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当前经济运行内生动力不足、发展后劲缺乏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即微观主体活力不足、后劲缺乏,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还不够好,在微观经济领域应减少政府干预;二是未来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通过政府的简政放权、加快改革,优化调控政策和措施,来打破对企业的创造力的束缚,进一步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

所谓“社会政策要托底”,则主要强调要构筑好社会保障这一市场经济的基石,筑牢防范市场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防火墙”。“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完善,一些风险防范的短板还存在,仍需加紧完善。”他说。

“当前唱衰中国的声音背后,实际上存在着让中国政府改变现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企图。”面对国外不少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释放出的悲观情绪,权威人士表示,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传达了坚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信号,“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总体上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一致,宏观调控政策不存在大的调整基础。”

8月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比上月微升0.2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等都出现回升。“这表明经济

进一步企稳向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下一步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应通过加大“稳中有为”的力度,实现全年乃至未来若干年的“稳中有进”。

稳中有进的“进”进一步发力

“虽然二季度增速与年度预期目标7.5%持平,但上半年增速高于今年预期目标0.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的确在去年第四季度短暂回升后持续走低,但连续五个季度经济运行在7.4%~7.9%的区间,说明运行是比较平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告诉记者,除了经济增速年度目标之外,稳中有进的“进”还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物价水平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0.9个百分点,给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是农业生产连续多年处于稳定状态,使得国民经济的基础牢固可靠。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2638亿斤,比上年增加39亿斤,冬小麦连续第十年增产。早稻、中晚稻、玉米等在田作物长势良好,全年“十连丰”基本已成定局。

三是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在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城镇就业保持了总体良好的态势。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25万人,完成了全年目标的80.6%。外出农民工达到1.7亿人,同比增加了444万人。

日前,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表示,我国区域、产业、行业、企业之间运行出现分化,有的日子比较难过,但有的见事早,行动快,能够主动顺应形势变化,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和结构转型升级,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这正是经济运行中孕育着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

从区域看,东部地区转型升级起步早,调整步伐快,服务业、制造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经济率先企稳,而且增速稳中略升,为全国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对经济企稳也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从产业看,在第二产业发展有所放缓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延续了去年以来增速稳步提高的势头,特别是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发展迅猛。

张立群分析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8.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5.3%,比去年年底提高0.7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包括物流、网络购物等服务业发展较快,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比全部工业高2.3个百分点;节能减排取得新成效,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4%,化学需氧量等排放量同比继续减少。“说明调结构取得阶段性效果,并且为稳定就业奠定了基础。”

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态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记者表示,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达到中高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部分区域开始迈向后工业社会。这决定了中国将从传统的一般制成品需求转向中高端制成品和服务类需求,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行业看,徐绍史指出,新兴产业发展快于传统产业,与居民消费相关的行业好于与投资相关的行业。医药、食品、汽车、纺织、计算机等行业稳定增长,通信设备、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的增速较快。

从企业看,在市场环境偏紧的情况下,企业主动调整的意识明显增强。虽然不少企业经营困难,但也有许多企业抢抓机遇,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调整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积极拓展市场,生产和效益状况良好。

下行压力下实现“稳中有为”

“平稳之中,困难也在显现。”张立群说,“在财力下降的情况下,财政资金的使用就面临考验。”他表示,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三年,“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到了关键时期,面临着资金如何有效保障的难题。

与此同时,各种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得到确保,这对保证消费的平稳增长也尤为重要。这正是中央提出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主要考量。

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把钱用在刀刃上。

综合项目投资和公共服务资金保障两方面的需求,张立群表示,下半年以至更长时间内,稳定市场需求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具体到拉动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则要求“稳投资”、“稳消费”和“稳出口”同步推进。受访专家认为,7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的部署正是包含了这样的用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也向记者表示,进一步公平税负、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三项举措都是“稳中有为”的具体表现,“包含了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同时策动投资、内需、出口三驾马车,既着眼改革大系统,又注意改善微循环。”

比如,投资方面,要求按照统筹规划、多元投资、市场运作、政策配套的基本思路,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他认为,铁路建设是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新型城镇化建设、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必要铺垫,是绕不开的“瓶颈”。加上此前对棚户区改造的部署,投资大体锁定城市和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领域。

“投资作为现阶段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必须重视发挥其积极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在王军看来,为使经济转入温和回升,应继续保持投资规模适度增长,未来固定资产投资保持20%左右甚至再略高一些非常必要,“应掌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可通过收费形成较为稳定的利益回报机制,可使用市场开发权让渡的准公共产品,政府都应尽可能创造更好条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中国经济‘保8’时,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按10%或12%安排,对现实情况缺乏预案,财政政策的安排也是按既有路径设计,与实现增长速度并不适应。”尹中卿认为,当前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各级政府对转型的认识更加深刻,转型的紧迫性和主动性也更加强烈,“探索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路径,正在成为各级政府自觉行为。”

采访最后,张立群认为,不论国内外情况如何复杂多变,“最大的基本面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最大基本面不会变,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谋求发展、谋求生活进一步改善的努力所能释放的潜力是巨大的,各方面发展的动力都很强劲,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中国不存在增长动力枯竭的问题。这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据《瞭望新闻周刊》

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途径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激发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首先,决策之前就要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听取群众的需求和意愿。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戴帽下达”,决策方案很多是从领导和专家中来,而不是从群众中来。我们说决策听取群众意见,不是让群众被动地接受,而是要将决策方案从群众中来,汲取群众智慧来制定决策。

其次,在领导班子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对群众的呼声和需求充分考虑。

再次,要真正贯彻好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不仅仅是领导班子内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班子多数成员是否代表和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问题。如果没有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那班子中的多数也是错误的,即便能够经过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通过。现在许多决策的出台不是没有程序,而恰恰是班子多数成员的意见不代表大多数群众。

用人要给群众更大的发言权

干部为什么人会脱离群众?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因为群众对干部没有制约力或者制约力不够,在干部选拔晋升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或者发言权很小,所以干部不用,不必花那么大气力联系群众。官帽子在上级手里,选票分散在同僚手中,只要得到领导的欣赏、同僚搞好关系就可以了。因此,要推动各级干部贯彻群众路线,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要给群众更大的发言权。

一是要正确理解“管管干部”。“管管干部”应该是更多地管干部的方针政策和主要领导干部。不能以“管管干部”为名,就阻碍群众在选人用人上的民主权利。“管管干部”和“群众选人”是不矛盾的,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是改变“一把手”包揽人事权的状况。在现有体制下,“管管干部”很容易变成“一把手管干部”。国内不少地区都已经实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做法,有利于“一把手”把精力放在抓大局和谋划长远上。

三是管人和管事适当结合。要充分发挥分管领导用人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的作用,这样就能够实现人与事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提高用人效率,促进工作的开展。

四是组织部门的干部工作要改进。要学会发动群众选干部,不要只会用自己的两只眼睛选干部,更不能把协助党委选干部变成与“一把手”搞鼓人事,要多和其他领导、用人部门商量,包括多听取和参考群众的意见。

五是探索把初始提名权交给群众的有效机制。要改变那种完全由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来提名的做法,让熟悉干部群众的群众也有把为群众办实事的干部提名上来的正当渠道和制度途径,可以民主推荐,也可以个人举荐,使群众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更有话语权。

要让群众实质性地参与监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说的就是群众能够在对我们的监督中发挥巨大作用。对于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监督,除了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外,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和社会力量的监督越来越凸显其威力和效果。

保障群众的知情权是满足群众参与权的前提和基础。让群众知情,首先要公开,不能暗箱操作。党务、政务、企务、校务、村务等,都要加大公开力度,能公开全部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只要把公开这篇文章做好、做到位,群众自然能够参与监督,群众监督的效果也自然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来。

提高各级“一把手”的群众意识至关重要

不可否认,在现有体制下,组织的作用关键在“一把手”。我们要运用好“一把手”的作用,努力使“一把手”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上发挥正能量。

要贯彻群众路线的要求,关键是教育和管理各级各类“一把手”牢固树立和培养“群众”这根弦,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各项要求贯穿于自己从政的始终,确保各级各类“一把手”是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利的人,是相信和依靠群众的人,是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的人。对年轻干部,特别要加大这方面的教育和锻炼,使其真正搞清楚“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等基本问题,从一开始就把习惯培养好,这是关乎我们党和人民事业长远的大事。

加快培养群众当家做主的素质和能力

必须看到,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已今非昔比了。因此,那些借口群众素质能力论来反对民主是站不住脚的。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民生工作,完全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甚至在一些领域可以实行直接民主,比如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群众民主素质比较好的地方,开展直选基层干部的试验。总之,要努力给大家创造更多的行使民主权利的机会和平台。

贯彻群众路线还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不要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谈民主。

第二,不要吊高群众的胃口,更不能收买和讨好群众。要严格依据政策办事,政策允许又没有条件的一定努力争取,政策不允许又没有条件的千万不能许诺。

第三,不要忽视组织的作用。要一如既往地充分发挥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把发挥组织作用和发挥群众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四,不要把群众路线的方法简单化。在实际工作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把握“民主”、“科学”、“法制”来办事。

第五,不要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不要用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要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

第六,不要上生病房下吃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范围是全党,但重点是领导干部,特别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要在前、作表率,防止把劲使到下面去。 杨文明

基层党组织如何搞好作风建设

实践证明,党的作风问题不仅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而且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我们党始终把思想作风建设视为党的生命,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建党之初的几十个人的党小组,到发展壮大成为今天拥有85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都是与我们党顺应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着自觉、自醒、自警的彻悟和坚持不懈地加强改进作风的作风建设密不可分。

党的十八大成功召开,掀开了我们党伟大历史进程崭新篇章。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号召。为早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党中央针对当前党内存在的违背党的宗旨,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不断侵蚀党的肌体的“四风”问题,作出了“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英明决策,并把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到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作风建设上,着眼于“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明确了对党内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不仅是我们党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增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大举措,同时也是我们党为实现党的十八大制定的宏伟蓝图而汇聚全党正能量,向全国人民保证如期交出合格答卷的必然选择。

虽然党中央已经明确了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为重点,但是作为党的肌体组成部分的县以下各级基层党组织,应自觉融入其中,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承上启下的桥梁纽带作用和覆盖面广、联系面广、接近群众等优势,有所作为,通过群策群力、群防群治,达到根除党内存在的顽疾之目的。

第一,各级基层党组织要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及整顿“四风”问题作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章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和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第二,各级基层党组织还要结

合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及要求,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认真查找“四风”在党员队伍中及自身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教育党员干部联系实际,以整风精神进行深刻反思和剖析,不等不靠,边学边改,边查边改,促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作风建设取得实效实实在在的成效。

第三,各级基层党组织一定要结合教育实践活动的总体要求,从夯实党建工作基础,转变工作作风出发,制订更加具体更能突出实效的工作方案,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推进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不懈地继续抓好党员先进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提升党员素质和能力,增强党员的责任感、荣誉感和归属感,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完善党员教育管理服务机制,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四,要切实发挥基层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的带头作用。常言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实际工作中也普遍存在着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的客观现实。这不仅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和期待,同时也验证了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的重要性。所以,各级基层党组织要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切实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教育党员干部必须要在思想上、行动上贯穿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本着正人先正己的原则,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党员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做到,真正做到密切党群关系等优良传统作风植根于心,见诸于行。

第五,各级基层党组织不仅是党的纲领和思想路线的积极拥护者,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具体推进者、贯彻者和实践者。因此,围绕目前我们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级基层党组织务必本着对党的事业忠诚负责精神,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精神,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立足本职,找准工作坐标,发挥积极作用,既要认真帮助上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会诊找症开药方,又要为自己请大夫对症下药,自觉整改自身存在的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既要反对不切实际的坐而论道,又要防止和克服“一阵风”的现象。我们党只有以优良作风同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才能众志成城,克难攻坚,才能共创一个更为广阔和谐的发展环境,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根本保障。

蒋郑英

地方政府该如何平衡财政收支

受营改增、审批权取消、中央财政支付压缩等影响,以中西部省份为代表的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增幅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但支出反而加大,且地方政府债务也到了集中偿付期,预计明年财政收支将更加困难。理论上,地方财政收支与地方的经济总量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过去,地方政府投资大幅增长,地方债务明显增加,虽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经济总量的扩张,但由于投资增长未能带来明显的正效应,地方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依然疲弱,进而影响到地方财政收支的平衡。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矛盾在近几年更加凸显。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状况明显改善。过去,中央财政吃紧,需要向地方政府借款。改革后,中央财政实力急剧增强,集中财力干大事的能力明显提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也显著增加。在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提高的同时,地方发展经济的任务反而加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投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央投资增速。2012年,中央项目投资增长5.9%,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21.7%,宏观经济依靠地方投资增长驱动的特征明显。由此带来地方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进而引发地方政府债务大幅增长。

提升经济发展的正效应,是促进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必然要求。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环境,创造适宜的商业环境氛围,吸引人才与科技的集聚,提高生态文明的质量,是形成地方经济发展正效应的关键。客观上,只有在存在一个适宜人们生活与发展的空间、商业、人文环境,才会促使人们不断地创造与发展,带来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在四者中,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很快记入GDP,其余三项都是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不仅难以在短期内实现GDP增长,而且还需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增加投入。因此,商业环境创造,吸引人才与科技资源,提升生态环境这三项工作,并不符合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的目标要求。一旦地方财政收支出现赤字,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加快土地出让速度,以维持短期内平衡。需要注意的是,土地出让最终要受到地方经济增长前景和居民购买能力的制约。如果不能提升经济发展的正效应,那么终究有土地难以实现出让的一天。假设地方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人们都已逃离,还有谁愿意一掷千金,花大笔金钱购置不产生任何经济价值的土地?

在经济转型进程中,在旧经济增长动力向新增长动力转换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经济增长下滑,进而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和总量。面对可能到来的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困难,是继续以往依靠土地出让或大量借款维持收支平衡,还是通过改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提升经济发展的正效应,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艰难选择。但无论如何,继续过去的发展模式与支出结构,已经没有太多回旋余地。既然如此,就应该拿出改革的勇气,义无反顾地打破束缚地方经济发展的旧模式。 叶峥

多些“零优势思维”

“人才是长着脚的,科技成果也是长着脚的,哪个地方环境优,创新资源就流向哪里,你这个地方就会沦为‘原油输出地’。”面对科教人才及历史文化资源比较优势,我们当多些“零优势思维”。一位领导同志的这番话,让人感慨良多。

用木桶装水,容量取决于最短那块板。用木桶装黄金,容量就取决于更多长板。比较优势,也就是某方面条件或资源相对更好,是一种相对优势,相当于“长板”,把“长板”拉长,是基本竞争策略。但比较优势毕竟不同于竞争优势,以为有了相对优势就能稳操胜券,最容易因自满自足而懈怠。多作“零优势思维”,就是看到相对优势的相对性,带着危机感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以免在“大混战”优势中丧失了自身优势。

“零优势思维”欠缺,一个典型表现便是“有啥不急啥”。比如在某市大小会议上,有组数据总是被反复念叨:“本市有50多所高校,600多个科研机构,70多万科技工作者,80多位两院院士。”但也是在这座城市,半数以上企业没有搞产学研合作,科教人才资源丰富与成果就地转化不足构成很大反差。从主观上看,就在于仗着本地创新资源丰富,“对接”科技成果反而不急不忙。于是,也只能“守着咸鱼吃淡饭”。

笔者所居的古都,曾被孙中山誉为:“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这种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然而,旅游资源丰厚而旅游消费水平低,却长期困扰着旅游业。说来说去,也与缺乏“零优势思维”有关。古城以优秀近代建筑而闻名于世,旧城改造中,优秀近代建筑时不时被拆毁也令人心痛。有人戏称:“拆了值钱的,盖了不值钱的。”因资源丰厚导致起来特大方,几乎已成不少历史文化名城的通病。资源厚实不知珍惜,难免“守着金碗要饭”。

“零优势思维”也是底线思维。身处底线位置要想崛起,唯有以“置之死地而后生”心态干事创业,哪怕只有“百分之一希望”,都要付出“百分之百努力”。世界上有些小国资源有限,但千方百计利用内外资源特色优势,某方面竞争力之强往往令人惊叹。遥想当年,深圳科技资源贫乏。今天,深圳因自主创新核心竞争力强大,被国际媒体惊呼“令人敬畏”。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就在于“零优势思维”催生主观能动性。有基础未必有建树,无基础未必无建树。变化之妙,就在思维。

有种思维误区由来已久,即“离了谁地球就转”。就地球而言,确实是离了谁都转。就社会而言,有无杰出人物,“转速”肯定大不相同。试想,历史上怎能没有司马迁,肯学上怎能没有曹雪芹,新中国科技史上怎能没有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多些“零优势思维”,才能摒弃“离了谁地球就转”心态,为杰出人物营造优良土壤,以免天才胚胎长成废豆芽,少些“虽楚有华,晋实用之”的遗憾。

老子有句话:“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事物总在变化中,多些“零优势思维”,“知‘长’而扬‘长’,忧‘优’而用‘优’,方能披荆斩棘,把正能量发挥到最大。 柳根